

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

陸 季 蕃

一、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制是決定於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基礎的。

右派分子在鳴放期中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旗號，對我們無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大肆進攻。提法各有不同，但在本質上都是反對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對於民主，有的右派分子說“美國政治民主，經濟不民主；蘇聯政治不民主，經濟民主”。也有單純地說：我們“只強調集中，專政而忽視民主是不對的”，更有大喊“爭民主”的。對於自由，也同樣地加以誣蔑，說什麼“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職業自由”，一句話，“不如國民黨時代自由了”。所有這些惡毒地攻擊和詆毀，都表明右派分子站在反動立場，用資產階級民主制反對我們無產階級民主制。

誰都知道民主和自由象其他上層建築一樣，是由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的。經濟基礎性質的不同，也就決定有根本不同的民主和自由。目前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因而也就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和自由。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則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最基本的東西，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存在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特權。其作用在於維持資本主義所有制，保護人剝削人的制度。這樣的民主和自由既是資產階級的特權，那麼，對無產階級也就變成一塊“禁樹”，如果要多少享用一點，那就要經過嚴重的階級鬥爭，否則，他們是不能問津的。所以列寧說：“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在實際上始終只是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里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

受的自由”①

列宁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谁有资本，谁就有了一切。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也是一样，美国的亿万富翁可以制造舆论，可以操纵选举，更能控制政府。摩尔根，洛克菲勒，莱蒙特，霍华德，赫斯特就是制造美国舆论的一批家伙。因此，伦德堡说：“美国报纸的真正主人应在亿万富翁中寻找”②。美国富豪操纵历届选举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正象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佛德尔所说的：“本届政府的官员已经养成习惯，每当石油公司吸了一口冷气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喷嚏”③。这句话固然是美国垄断集团间狗咬狗的说法，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完全控制在垄断集团手里。亿万富翁既然掌握舆论、选举和政府，那末，它们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货色也就不言而喻了。

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不是如此，它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全体劳动人民所享受的特权。它的作用在于消灭剥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是不能享有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因为这批家伙是刻骨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使他们不能利用这种合法形式进行反抗，只有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保证广大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是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们的民主制度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由于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全国人民手中，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这就保证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能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目前全国有五百多万人民代表，代表着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任何人都可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意见，都可通过自己组织——共产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过去全国人民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草案就是一例。最近又在全国范围展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讨论，以及整风运动等等，都说明我们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各民族也都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机关，管理着本民族的事务。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没有任何干扰和压迫的环境中，从事工作和劳动，这是解放前不可想象的事。这样奇迹的出现，归根结蒂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分不开的。

右派分子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是一笔抹杀的，由于他们别有用心，认为我们民主不如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选集，莫斯科中文版，二三五——二三六页。

② 伦德堡：“美国六十家族”，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二九九页

③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資產階級民主，因而“要治英美的政治民主與蘇聯的經濟民主為一爐”。這就是說他們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這是非常反動的。不僅在理論上是一種修正主義；在政治上也是包藏禍心的。

從理論上講，我們的民主和自由是同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分不開的。右派分子們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民主的，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我們的民主制度必然也是民主的。這本來沒有任何疑問的。可是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之流却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我們政治不如英美民主，從而要移花接木，把英美的民主制度搬到我們中國來，這不是徹頭徹尾要修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嗎？所以在理論就是要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從政治上來講，他們更隱藏着很大政治野心。他們明瞭政權問題是最根本問題，要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消社會主義，必須把自己變成政權中的領導者，但是在中国條件下，他們是沒有武裝可以達到這樣目的，所以要用篡改民主制度的方法。大叫大嚷地說不如英美民主，就是為篡改我們民主制度製造借口，如果他們的野心實現了，就會把資產階級的一套政治把戲全盤地搬到我們中國來。例如英美的兩院制，兩黨制等等。章伯鈞不是講過：“事實上資本主義也還有活力，就是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嗎？不難看出他們販賣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的目的，就是要趕中國共產黨下台，使資產階級上台，取消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我們知道，辛亥革命以後，這一套的資產階級政治把戲，不是一再實行過嗎？不但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甚至連資本主義都未能實現，結果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這個慘痛的历史中國人民還是“記憶猶新”的，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之流的鬼把戲是騙不了任何人的。全國的大小右派分子對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的叫嚷齊聲喝彩，就是因為他們具有一個共同的最終目的，要推翻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這個最終目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中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因此章伯鈞就認為：“是一件大大的憾事”。可是在中國人民看來，卻是一件大大的快事。

历史証明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既不能實現，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是更不可能實現的。這說明右派分子的狂想是違反民主制度發展規律的。

二、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制發展的趨向是不同的

民主和自由都有發展規律的。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曾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历史上發生發展的”。不過由於民主自由的性質不同，它們的發展規律也就有所區別。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发展可以說是這

样：由多少有一些形式的民主自由，在不断限制中逐渐缩小，以致到今天几乎消失殆尽（这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时发生的。当时根据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把民主解释为：尊重个人人格，承认每个人在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上都有平等机会的权利；把自由解释为：无限制的自由活动的权利。这样的解释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无耻掠夺的意图，在当时是起了一定进步作用，这就是一方面对封建制度起了批判武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骗取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周围。终于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这样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在资产阶级爬上统治地位后，并没有实现，而且也从来没有实行过。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里曾经公然宣布：“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他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职务，公职和工作；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六条）。这是有关民主的一个规定。对于自由也宣布说：“自由就是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此等限制仅由法律规定之”（第四条）。这个宣言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奠基石，但是它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体现在1791年法国宪法里。这个宪法规定国民仅能通过委托的方式行使权力，于是立法团和国王都被认为是国民的代表；又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果，一些无产者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只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法国资产阶级已把人权宣言中所宣告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打了一个折扣。当然还有许多单行法规限制了罢工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样，民主和自由就变成资产阶级独自享受的特权。所谓绝对民主（又叫做“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绝对自由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既没有实现过，更不用说在今天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了。右派分子的大叫大嚷，不过表示他们只要民主不要专政，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罢了。没有专政就不能镇压敌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无法存在。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成为空话。这不说明他们反动透顶吗？

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里固然没有绝对民主，绝对自由，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正在上升，阶级斗争不很激烈，资产阶级需要在民主和自由的掩护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还能高唱自由，维护民主。象斯大林所说的：“从前，资产阶级高唱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①。这样民主和自由既然都是资产阶级的，就免不了是形式的，局限的和虚伪的。劳动大众并不能充分享受，但是还能或多

^① 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人民出版社版，六页。

或少地加以利用，做为反对資產階級无耻地奴役和压迫的合法根据。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1年时还是工人階級政党）利用1866年的普选法，在1871年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①。可是德国資產階級馬上就加以反击，公布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律。这说明資產階級民主就是专政，資產階級自由就是限制。在資產階級宪法里充分地反映了这点，所以馬克思在批判法国宪法时就曾说过：“宪法中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物，……在一般詞句中标榜自由，在注解中废除自由”^②。这种情况随着資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不是減輕而是加剧了，对民主和自由加以更多的限制，在宪法上常常規定依“法律”国民才有某种权利或自由。而法律是統治階級可以随时制定的，只要他們認為必要，就可制定法律取消或限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这时資產階級已經不再高唱自由主义，而是把民主自由当做危險的东西。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由于經濟上垄断局面业已形成，政治上反动更加显然。尽管資產階級統治人物还用“自由国家”，“自由世界”来骗人，可是在事实上民主变成了法西斯式的专政，自由变成了无限的奴役。所以斯大林指出：“現在，連自由主义的影子也一点沒有了。所謂个人自由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仅仅那些拥有資本的人們才被承認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則被当做只适于供人剝削的人料”^③。美国制定了許多反动法規，已經証明了这点。右派分子們因为站在反动立場上，对这些事实并不認為是反动的。竟說英美政治是民主的。这不撒天下的大謊嗎？

如果說英美等資本主义国家还有一点残缺不全的民主和自由，那不是由于垄断資本家的自願，而是无產階級和共产党領導全国人民不断斗争的結果，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罢了。

从上述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发展过程中，可見“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都沒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資產階級民主”^④。所謂絕對民主，絕對自由不过是右派分子一种反动的幻想罢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不承認絕對民主，絕對自由。在无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过程中，也証明了不存在着这种民主和自由，只有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紀律。这些都是統一体的两个方面，既不許割裂，也不能單純承認这一面而否認另一面，它們是

① 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一〇五頁。

②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同前書，二三六頁。

③ 斯大林：同前書。

④ 列 宁：“共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28卷，中文版，四三五頁。

統一的。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即用這樣的民主和自由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從不用絕對民主，絕對自由的動人名詞來欺騙任何人。例如1918年蘇俄憲法即規定：“現在當無產階級與其剝削者進行決定性鬥爭的關頭，在任何一个政權機關中都決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余地，政權應當完全唯一屬於勞動群眾及其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同時，在第二編中規定勞動者享有各種自由，第四編中又明確指出剝奪剝削者和一切反動分子的選舉權。這說明無產階級民主和自由對勞動人民來講是廣泛的，對剝削者和反革命分子則是完全沒有分的。在我國也是一樣，不論共同綱領或憲法都規定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對人民則給與各種的廣泛民主權利，對反動派和反革命分子則實行專政。這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必然現象。

當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或者取得基本勝利時，由於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由於反動派和反革命分子已經消滅或基本上消滅，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民主和自由。除擴大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並給以物質保證外，對已改造成為新人的反動階級分子，也給與相當的民主權利。例如1936年蘇聯憲法即恢復了剝削階級的民主權利。在我們國家里對於右派分子除累戒不改，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者外，儘管他們在本質上是反動派，是人民的敵人，但是仍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甚至“仍然允許他們有言論自由”。這都說明在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或基本上取得勝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民主和自由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與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恰好相反。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和資本主義得到發展的條件下，不是擴大而是在許多限制下縮小了甚至取消了，完全不能同無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相比擬。所以無產階級民主和自由是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但是這樣的民主和自由也決不是右派分子所喊叫的絕對民主，絕對自由。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民主和自由只給與人民，對人民敵人則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所絕不可缺少的。如果象右派分子所主張的，不論對人民或敵人一律實行民主，或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紀律，那末，勢將變成無政府，無組織的狀態，其結果必將取消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所以必須堅決反對絕對民主，絕對自由的叫囂，以免敗壞我們無產階級民主制度。

總之，絕對民主，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在未取得政權前，反對封建制度的一種政治幻想。在當時還有一定進步意義。可是右派分子把它搬來反對無產階級民主制，不只沒有任何進步意義，而且是徹頭徹尾反動的。

三、无产階級民主制代替資产階級民主制 是必然的規律

根据以上所述，資产階級民主与自由同无产階級民主和自由发展的規律是不同的。資产階級民主和自由，从形式上有一些民主自由，在不断限制中日益縮小，到今天几乎消失殆尽。相反的，无产階級民主和自由則从有限制，而逐漸取消限制，以致不断地扩大。这样不同的发展正說明无产階級民主制比資产階級民主制优越不知多少万倍。从而无产階級民主制代替資产階級民主制也就成为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列宁曾經說过：

“由专制主义到資产階級民主，由資产階級民主到无产階級民主，由无产階級民主到完全无有”，①这正說明无产階級民主制代替資产階級民主制是必然的規律。反映了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必然性。

当然无产階級民主制不会自然到来的，必須經過严重的斗争才能取得。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爭取无产階級成为統治階級，才能消灭資产階級民主制，实行无产階級民主制。其次，即在取得政权后，立刻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把反动階級占有的生产資料变成国家所有，才能保証无产階級民主和自由的实现。最后，必須剝夺一切反动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这些就是无产階級民主实现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这些基本条件，所以能够消灭資产階級民主制，广泛地享有无产階級民主和自由。

这样的变革誠如列宁所說的：“这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資本的桎梏”②。可是右派分子对这样变革却衷心地厌恶，总想用資产階級民主制来代替无产階級民主制。为此就从資产階級武庫中拿出“武器”来詆毀我們民主和自由。这种事例本来是不少的，姑且以肖乾为例。他引用西欧所謂“豪迈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牺牲我的性命，来維持你說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并解释說：“这句话里蘊藏着他們对自己的宪法，对他們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因而就得出一个結論来：“准不准說不对的話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驗”。根据这样的結論給我們民主和自由，下了一个“判决”：“可惜我們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說：每个中国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写作的自由了”。暫且不說他所說的每个中国人是包括那些人，也不必說我們民主和自由是为了那些階級的。只就肖乾所写的：“放心，容忍，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解放社版，七〇頁。

② 列 宁：“論‘民主’和专政”，列宁全集，二八卷，中文版，三五—頁。

人事工作”来講，对我们文艺领导，宪法和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意的誣蔑。这是党和人民所不允許的，可是也讓他說了写了并且为他登在人民日报上，对其他許多右派言論，也无例外。即使在今天对右派分子“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为何“不能进一步說：每个中国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写作的自由了”呢？如果說我們宪法是不民主的，不妨回顧一下历史，这是有益的。現代的資产階級宪法已經反动透頂了，我們不必提，就以最早的資产階級宪法——美国宪法来講，当然右派分子認為是民主的，可是在1787年通过时，就沒有規定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人民的反对下，于1791年才修正补充一些。1791年法国宪法是革命胜利了的資产階級宪法，根据人权宣言制定的，虽然規定了言論自由，但对宣传无神論的自由，就只字未提。可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宪法就規定了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我們宪法对此虽无明文規定，但是根据陆定一同志講話，在宣传无神論上还是有有限度的自由的。他說：“为了有利于无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团結，避免发生冲突起見，无神論者不到教堂，寺庙里去做反宗教宣传，有神論者不在教堂，寺庙以外的公共場所进行宗教宣傳，这里，无神論者和有神論者双方在宣傳上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①。能說这不比資产階級的“民主”宪法更民主嗎？

还有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不是窃取資产階級理論，而是硬搬已經过时的口号，作为反对我們民主自由的法宝。例如有不少右派分子就大喊“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权”。这些口号本来是資产階級在反对封建統治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資产階級爬上統治地位时，所謂民主自由等等变成資产階級的特权，劳动人民則成为它們的牺牲品，所以“爭民主，‘爭自由’”等等即成为騙人的口号。解放前，在蒋介石法西斯統治下，党領導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时，曾經提出过：爭民主，爭自由的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因为在蒋介石法西斯統治下，中国人民是沒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动派爭取是完全必要的。解放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經享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宪法上也肯定了这些权利，并給与物質保証，还提出这些口号就不能不是反动的。若是为反动派，反动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爭，那正象刘少奇同志在宪法草案报告中所提出的“那就只能使他失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已經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时代到来了。从此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即不断地在欧亚各国取得胜利。这样的发展，正說明无产階級民主制代替資产階級民主制是符合社会发展規律的。不管右派分子贩卖那一种資产階級的貨色，都是阻擋不了的。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新华半月刊，1956年13号，七五頁。

当然，无产階級民主制还会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階級民主制也就更加完备。但是“民主制愈完备，則要变成贅物的时候便愈逼近。由武装工人所組底的‘国家’——即‘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愈民主，則任何国家开始消亡得愈迅速”①。所以列宁說：“国家底消灭也就是民主制底消灭，国家底消亡也就是民主制底消亡”②。在无产階級民主制消亡后，剩下來的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做为管理社会生产的原則。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正象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专政的对象沒有了，专政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問題，但已經不是“民主与专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的民主了”③。右派分子不了解这点，把“民主与专政”的民主同“民主与集中”的民主混淆起来，硬說：“馬克思如果提出共产主义要消灭，那馬克思是錯了”（按：恩格斯曾說过：“我們党底最終政治目的是在消除全部国家，因而也就是消除民主制”——作者注）。其实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制消亡的学說并沒有錯。它所說的“民主制消灭”，“民主制消亡”是指“民主与专政”的民主而言，也就是做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有系統的强力”，在国家消亡时，它当然也就消亡。相反的，“民主与集中”的民主則是統一人民意志，統一人民行动所必需的，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們說錯誤的，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这些右派分子，他們想利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干着修正主义勾当。

① 列 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二卷，二四九頁。

② 列 宁：同上書，二三一頁

③ 陆定一：“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1957年15号新华半月刊，一〇四頁